

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研究

陈 宇 翔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研究/陈宇翔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

ISBN 7-81053-572-2

I. 中… II. 陈… III. 政党—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339 号

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研究

Zhongguo Jindai Zhengdang Sixiang Yanjiu

陈宇翔 著

☐责任编辑 王和君

☐封面设计 张 毅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594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 开 ☐印张 7.5 ☐字数 180 千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1053-572-2/D·55

☐定价 18.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 请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引 论

第一章 古代中国的传统与近代西方的现实

- 一、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朋”、“党”与传统思想中的
“朋党”观念 (1)
- 二、近代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
..... (10)
- 三、戊戌以前先进中国人对西方政党的朦胧认识..... (21)

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政党和政党政治透视

- 一、清末政治团体和政党的初步发育..... (26)
- 二、民初的政党和党争..... (35)
- 三、民初的政党政治..... (43)

第三章 继承与超越

- 孙中山政党思想 (47)
- 一、民初孙中山的政党观念和政党政治主张..... (49)

二、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政党思想的发展·····	(64)
三、孙中山政党思想的评价·····	(69)

第四章 错位的理想与现实

——梁启超政党思想·····	(72)
一、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政党思想的萌发·····	(73)
二、民初梁启超的政党思想·····	(90)
三、梁启超对民初政党政治的反思·····	(123)
四、梁启超政党思想的地位·····	(131)

第五章 思想者的驿站

——秦力山的政党思想·····	(134)
一、党派的存立,实为天下之常理·····	(136)
二、民初政党思想的发展和实践·····	(139)
三、立党的原则和途径·····	(141)

第六章 虔诚者的梦想与悲剧

——宋教仁的政党思想·····	(145)
一、清末政党思想的初步形成·····	(145)
二、民初政党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150)

三、宋教仁政党思想的简要评价	(164)
----------------------	-------

第七章 忠厚者的固执

——黄兴的政党思想	(165)
一、党派属性和党派活动	(165)
二、建设革命党的思想	(167)
三、民初的政党思想及特点	(170)
四、“二次革命”后孙、黄政党思想的分歧与评价	(178)

第八章 变幻反复中的真象

——章太炎的政党思想	(182)
一、党派活动与实践	(182)
二、政党思想的演变和特点	(185)
三、章太炎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191)

第九章 独行者的善良与尴尬

——章士钊政党思想	(196)
一、有关政党的一般观念	(198)
二、提倡两党制	(201)
三、瞩目政党政治	(202)

四、“毁党造党”说及其影响	(206)
结 论 失败者的有益探索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历史评价	(215)
一、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的主要特点	(215)
二、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218)
参考文献	(223)
后 记	(229)

引 论

自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确立并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以来，政党与政党政治几乎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部分。时至今日，无论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无不在各国政治中发挥着性质不同的重要作用。“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335页）今天的现实是过去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从19世纪末起始，中国人开始学习、移植和实践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辛亥革命发生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短暂的民主共和国的实践，出现过雨后春笋般林立的政党，仁人志士也曾经追求并企图实现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理想。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的复杂原因，本民族的和外民族的不同传统背景，本国的和西方的不同政治环境，使得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追求的理想和艰难的实践，一一化作镜花水月，如过眼烟云。从那时至今日，中国人谈及那段历史，恍如隔世，亦了无善感。对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热情介绍、提倡、实践过的政党思想，人们也是不屑一顾，目之为失败者的呓语。但是感情的义愤和向背不能替代理性的思维和评价。求本求真的学术探索，既可以还前行思想者们原初

的思想轨迹，又可以成为今人和后人继续前行的思想驿站。

拙著将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目的就是梳理和研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探求和阐述，并力图作一些自以为是的评价。

研究这一问题，辟头面对的就是如何界定政党和政党政治这两个关键词语。“政党”一词，在英语为 **political party**；**party** 源于拉丁语 **pars**，含有部分之意。部分系对全体而言，全体之中既含部分，当然就意谓还有其他部分与其相并称对立。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史载中，没有“政党”这一词汇，而只有“党”、“朋”、“会”、“朋党”等名称相近的词语。中国人开始使用“政党”这一称呼，据笔者目前的考证，源自日本，而日本又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 1868 年写成的《西洋事情》中，就已记载了“政党”一词（《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第 291 页）。中国近代史籍中第一次使用“政党”一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具体而言，是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该报总第 17 期刊载了直以“政党”名之的长文《政党论》。该文由日本人古城贞吉译自日刊《大日本杂志》。从此以后，“政党”一词逐渐为国人熟知并使用。

至于政党含义如何，从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代表不同阶级观点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进行过多种阐释。其中当然以马克思主义者从经济的背景和阶级的观点出发，给这一名词所下的定义最准确，最科学。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下的定义，也因为侧重点的不同，表述方式颇不一样。笔者将“政党”的定义

归纳表述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由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中政治上最积极的部分按一定原则结合而成，以实现其根本利益，主要是以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为目的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征，除这一基本特征外，政党还有如下一些共同特征：共同的组织系统，领导机构、领袖和纲领，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党的纪律做出规定，并为其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此为标准，政党与一般政治性团体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党活动总是围绕政权问题而展开。一般而言，政党都是把争得政权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在取得政权后，又要巩固政权，把本阶级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而贯彻于整个社会。

“政党政治”一词，在我国一般又称之为政党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没有给过明确的界定。“政党政治”英语中为 **party system**，人们将它译成政党制度或政党政治，其实都不太确切。因为在中文中，“制度”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均指此意。其二是指一套成系统的法规或规定，如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等。用这两种含义理解“政党制度”或“政党政治”，均无法提示其正确内涵。比较正确的称法应叫做“政党体制”。但因为人们对“政党政治”即“政党制度”这一概念的使用习惯已约定俗成，所以仍为本文论述时所采用。所谓政党政治（即政党制度或政党体制）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党行使和干预国家政治权力的一种形式，是政党出现以后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主要方法、方式和程序。无论

什么政党，其目的都是为了取得政权。由此而形成的各政党之间、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网络或结构，就构成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因而政党政治又主要表现为政党从政模式。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类型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政党政治的性质和形式也就存在着差异。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就是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由赢得选举胜利的政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具体政体模式中，主要表现为议会内阁制和总统制，前者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最为典型，后者以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最具代表性。在政党存立和竞争模式上，又可归纳为三种：两党政治、多党政治和一党政治。需要指出的是，在清末民初的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尚只存在前两种模式，即两党政治和多党政治，前者形成最早，影响也最大，英、美最典型；后者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国家，法国最典型。

笔者结合中国近代特殊的政治变动环境，将“中国近代政党思想”表述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党观念和有关政党建设、政党政治的思想。其中既包括他们对西政党与古代中国朋党的认识，也包括这一时期在移植和建立西方式的政党和政党政治过程中，对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介绍、输入的大致情况，以及在实际过程中所记载下来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念中，所谓政党主要是指存立于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以合法手段竞争以参与和取得政权的议会政党，政党的存在是以承认现实政权的合法性为前提。反之，那种通过推翻封建政权以取得本阶级统治的

资产阶级革命党不被他们认可为政党。这一观念也明显地影响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等不用说，即使是直接领导革命政党进行反清反专制斗争的孙中山、黄兴等也都不把同盟会等视为政党，而另称革命党或民党，并极力要将二者的涵义加以区分。限于本文所要涉及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仍将按照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思想轨迹来展开研究，即侧重点是对这一时期人们的议会政党思想进行研究，同时也兼顾革命政党，但后者大体上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个时代的思想客观上说来是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但具体又表征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通过思想家个人、时代的思想热点及思潮表现出来。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拙著选取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党思想作为研究重点，并结合这一时期围绕政党和政党政治而产生的几个思想热点切入。时段上主要涵盖戊戌维新运动至五四运动前，这段时间虽然短暂，却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之一，也是我们观察中国政党活动和政党政治的“黄金时期”。

第一章 古代中国的传统与近代西方的现实

中国近代政党思想的萌生绝非空穴来风,其思想来源概括起来,可以说有两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朋党”观念与近代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党现实与政党观念。二者之中,又有主次之分,后者为主,前者为次。这一判断既符合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也符合近代中国政治思潮变迁的大势。

一、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朋”、“党”与传统思想中的“朋党”观念

1.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朋”与“党”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就有政党。政党是阶级斗争进行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君主专制时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世界历史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君主,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而被统治者奉行的政治信条大多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民是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因此,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与民主政治相伴生的政党是不可能出现在封建社会的。但是,绵延几千年的

中国历史又确实与连续不绝的各种党争相依随。细究起来,中国古代的党争实际上就是所谓朋党之争,在涵义上与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党政治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从词源意义上来说,“朋”原本指货币单位。王国维《说珏朋》一文考证,上古以贝壳充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诗·小雅·青青者莪》云:“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由于“朋”字含有串连、聚集之义,以致后来又引申出了“群”、“类”等义。《山海经·北山经》里有“群居而朋飞”说。《周易·系辞上》云:“方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而有朋,就有群体组织的出现。朋在此意义上又演绎出同门、志同道合这一层含义。孔子《论语·学而》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休注“同门曰朋”。“党”的含义在早期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戚属。《周礼·坊记》:“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其二,指古代地方基层组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百家为党,二十五党为乡。《论语·雍也》谓:“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三指同伙之人。《左传》僖公十年:“(晋)遂杀丕郑、祁举以七舆大夫,……皆里(克)、否之党也。”四有阿附、偏私意。《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也将同道结合的组织称作“党”,将同道结合的人称为“党人”。屈原《离骚》曰:“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后汉书·灵帝记》建宁二年:“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以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由于“朋”、“党”二字均有朋比、党附的含义,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两字就渐趋合一,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已有了“朋党”一词,并常为人们引用。如韩非子即说过:“群臣朋党比周,心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①从语源上来看,中国“朋党”一词与西方“政

^①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日第1版,第32~33页。

党”语源的 pars 一词,意义相差甚远。

朋党这一现象,源远流长;朋党之争,自古亦然。欧阳修《朋党论》言:“共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据《左传》记载,欧阳修所言不虚。在先秦诸子眼里,比周就是朋比结党所为。从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朋党现象看,朋党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血缘区别、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形成和争夺的起因。朋党以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垄断仕途、独占各项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以党同伐异为特征,而以攻击和残害政敌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

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自来以党为非。然而党争却绵延不绝,充斥于史。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朝廷中不同的宗派集团以党相别现象已很常见。如齐国的公子牙之党、晋国的里克、丕郑之党、栾氏之党、郑国的子阳之党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朋党。各国的士卿大夫,均通过结党,扩充势力。东汉末年,太学生互相标榜,评说时政,抨击阉党,演成相争之势,党锢事件遂随之演起。唐代官僚因仕途相连,彼此出入,结成派别,遂致绵延不断的牛、李党争。宋代党争已具新的特点。仁宗时,石介有《庆历至德诗》,激浊扬清,稍生介蒂。英宗之后,洛、蜀、朔三党互相争异,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秉政,而新旧两党形同水火,不可一日相容。驯至绍圣、崇宁,党祸大起,国事日非。在南宋,也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别。其后,伪学之禁,小人借朋党中伤君子。在朋党之风的影响下,两宋太学生开始结缘政治,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太学生干政现象。虽尚无结社,但已开启后世士人结社干政的风气。明代党争与士绅结社桴鼓相应,延至明末万历前后,遂成燎原之势。先有顾党、李党之目,继之有所

谓昆党、宣党,到万历四十年以后,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之分。至天启、崇祯朝,党争更剧,所谓东林党即活跃于此时。明末党争,延续至南明甚而清季顺治、康熙二朝而不绝。相比较而言,清代党争稍显寥落。清政以高压名世,臣工可以互相诋诮,却断不容有指斥乘舆之语。大臣稍涉党嫌,即获重罪。此种风气延至嘉、道而不移。至清末,朝政衰落,西风东浸,不得不变,遂致会社、政团崛起。^①

自古以来,结党者大多不敢以朋党自喻。都是“以人君忌朋党,反对者无不以朋党加之。”^② 朋党与皇权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又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其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因为只要有皇权存在,朋党就有充分生存的条件,难以铲除。朋党究其实质来说,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因为封建社会中,皇权虽然高高在上,但它又是极端孤立的。皇帝君临天下,靠的是个人能力来行使权力、操纵国家,完全没有什么制度保障。一旦皇帝能力不足,权力必然倾斜。而且,皇权更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角逐的对象。因而,皇权的行使,就需要皇帝在整个统治阶级中寻找最可靠的势力和集团,成为其赖以统治的核心。如果皇帝不依赖于任何政治势力或失去任何集团对他的权力的支持,其权力就会被架空,就会衰落,统治就会发生严重危机。因而皇帝无论用哪个剥削阶级集团的人,都避免不了各种派别和集团的产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性,以及封建社会各个阶层、政治派别的相互依赖性、从属性,决定了官僚士绅必须自聚或结成帮派团体,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夺取或巩固权位,从而使官僚之间形成互相制衡或对抗的力量。这种具有共同利益的朋党集团,不仅是官绅飞黄

^① 参见陈宝良著:《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② 顾震福:《民国经世文编》第1册第174页。

腾达、纵横捭阖的依恃,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虽然备感嫉恨和棘手,但也无法排解。

2.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群”和“朋党”观念

朋党现象和朋党政治早已引起古人的重视,试图对朋党这一政治现象从多方面解释者颇不乏人。服务于统治者的舆论历来视“党”为不祥之物,这种观念也浸及普通士绅和百姓,积淀成一般社会心理。《论语·述而》道:“吾闻君子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荀子·强国》强调“不比周,不朋党。”根据儒家“王道”的标准,虽不排斥合群,却摒弃朋党、争竞。讲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是儒家政治道德的重要特征。儒家的这一思想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主臬,用之作为控制臣民的有效思想武器,是打击臣下朋党比周的棍棒。如果说儒家主要是从封建道德规范和纲常伦理的角度来评说朋党的话,那么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对朋党的谴责已不限于从道德上来进行。《韩非子·有度》言:“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他们从制度上提出了一整套禁绝朋党和制驭朋党的办法。如运用赏罚、权术等措施,防患于未然,对朋党要以“镇”、“固”、“网”、“探”、“离”等各种手段予以打击,还要建立“群臣守职、百官有常”的政治秩序,等等。历代统治者统治臣民奉行的均是“外儒内法”,因而儒、法各家对朋党的摒弃和谴责就被封建皇帝奉为不二法门。上自先秦,下迄明清,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对结党的政治思想和传统观念。历代专制君主“疾党如仇,视会如贼,”禁令多多。《大明会典》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① 顺治年间也有严禁结党的上

^① 《大明会典》第162卷,律例三第14页。

谕：“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①时至晚清，此种严厉政策依旧顽固存在。梁启超组政闻社时，即深有感触：“中国旧史之谬见，以结党为大戒，时主且悬为厉禁。以政闻社置诸国中，其安从生存？政府摧萌拉孽，一举手之劳耳。”^②直至武昌起义后，党禁洞开，深受其害的康有为即咏“千秋伤党锢，禁网至今开”诗句以感怀。^③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政治状况和文化氛围中，让人们完全隔离于群体生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士大夫向来奉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以学会和政治性结社“清议”朝政的现象或合法、或非法地存在着。由学会而干预政治，这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传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意识是中国人社会生活方式的精神动向，无论这种动向是政治的、文化的，还是经济的。“群”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对传统的合群精神持肯定的态度，使之上升为与禽兽相别的一个重要条件。《周书·周祝篇》说：“用则必有群。”《礼记·学记》云：“敬业乐群”。荀子更说：“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另一方面，对群体加以制约、规范，以使群体不伤“王道”，即群体的存在不以对君主的统治构成威胁为前提。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历史上所有结社的倡导者或社会群体的组织者，虽不大敢为朋党唱赞歌，但无不对群体的存在辩护；同时，还以群体制约独夫，对君主专制提出一些抨击。至明末清初黄宗羲甚至提出学校议政，还带有了一点议会的色彩。到清末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等人已敢公开

① 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季党社运动考》，1934年商务印书馆第1版，1982年11月中华书局重印，第87页。

② 《政闻社宣言书》，《梁启超选集》，李华兴、吴嘉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第546页。

③ 《辛亥重九日闻党禁开》，《康有为政论集》下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2月出版，第651页。